



郭成康 著

原书空白

十八世紀的 中國政治

郭成康 著

原书空白

昭明文史 34

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

編著者／郭成康

發行人／謝俊龍

總編輯／吳明興

副總編輯／陳聖元

出版／昭明出版社

臺北市溫州街 75 號 3 樓之 4

Tel : (02)2364-0872 Fax : (02)2364-0873

郵撥帳號：16039160 知書房出版社

登記證／北縣商聯甲字第〇八八〇五六一七號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 367 號 3 樓

Tel : (02)2641-8661 Fax : (02) 2641-8660

出版日期／民國 90 年 5 月 第一版第一刷

定 價／420 元

知書房網站／<http://www.clio.com.tw>

知書房 E-mail／reader@clio.com.tw

※版權為知書房出版集團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缺頁、製幀錯誤，請寄回更換※

ISBN 957-0336-75-7

Printed in Taiwan

原书空白

目 次

自序	011
緒言	015
第一章 十八世紀極端專制政體的強化和完備	059
第一節 順康時期乾綱獨斷政治目標的初步實現	/059
一、順治年間的內三院與內閣	/060
二、康熙帝御門聽政	/069
三、內閣和議政王大臣會議	/082
四、十七／十八世紀之交極端專制傾向的加強	/091
第二節 奏摺的創行和推廣	/101
一、順治年間官私文獻提及的「奏摺」	/101

第二章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強化

第一節 部院與督撫的權力配置 / 248

247

二、康熙朝的密摺和非機密性奏摺 / 106	
三、康熙朝奏摺制度漸具雛型 / 126	
四、雍正朝奏摺的推廣 / 134	
五、由奏摺推廣而引發的問題及對策 / 152	
第三節 密諭的嬗變與軍機處的肇建 / 170	
一、密諭溯源 / 170	
二、雍正密諭之一：硃批 / 175	
三、雍正密諭之二：親筆硃諭與代書硃諭 / 179	
四、雍正密諭之三：廷寄 / 184	
五、軍機處漸具規模 / 197	
第四節 十八世紀中國的國家中樞——軍機處 / 206	
一、軍機處的機構、職掌及運作的規範化 / 207	
二、軍機處建立前後內外衙門及相關制度的全面調整 / 216	
三、對儒家聖君賢相政治理念的批判 / 239	

第一、部院與督撫相維相制 / 248	
二、皇帝對內外政治運作的控制、協調和監督 / 251	
三、督撫財政、人事權限的盈縮 / 265	
第二節 中央決策與地方的關係 / 304	
一、中央決策體制 / 304	
二、地方利益對中央決策的影響 / 324	
三、地方利益在中央決策時的地位 / 342	
第三章 十八世紀後期政治的腐敗 / 365	
第一節 政治腐敗的種種特徵 / 367	
一、貪污賄賂向集團化犯罪惡性發展 / 367	
二、貪贓數額之巨前所罕見 / 371	
三、形形色色的陋規氾濫成災 / 379	
四、庫帑嚴重虧空 / 385	
五、大臣官員介入營運交易牟取暴利 / 390	
六、嚴刑峻法難以遏止貪賄腐敗之風 / 400	
第二節 十八世紀後期政治嚴重腐敗的原因 / 412	

一、極端專制政治體制的痼弊	/ 413
二、立法與執法的失誤	/ 460
三、孳生政治腐敗的社會溫床	/ 476
四、士大夫道德自律堤防的潰決	/ 492
第四章 千秋功罪
——從英國首次訪華使團對中國政治的觀感談起
參考文獻

505
511

自序

中國至少已有數千年的文明史。

如果以耶穌降生為分野的話，西元後的中國歷史也已延續了整整兩千年。為甚麼在流淌不息的歷史長河中偏偏選擇十八世紀這一百年的中國政治作為研究對象呢？

西元一七〇一年，即十八世紀的開端，正當清代鼎盛時期即將來臨的康熙四十年；西元一八〇〇年，為史家豔稱的「康乾盛世」，也隨著十八世紀的終結而落下了帷幕；那一年是嘉慶五年，太上皇乾隆在十個月前剛剛謝世。

在這一百年間，以皇權極度膨脹為表徵，中國古代政治史和政治文化史都翻開了新的一页。

秦漢以降，至於盛清時代揭幕之前，總體說來，中國政治體制是具有一定開明色彩的君主專制。不僅廣大士人和士大夫一致認同孔、孟、荀等大儒所闡釋的君臣關係及君臣權力配置的政治理念，而且稍有胸襟識見的帝王怵於秦、隋二世而亡的炯鑑，也不敢把專制權力膨脹到極端。作為制度上的保障，則有宰相制及諫議制的設計，以實施對皇權某種程度的限制和制衡。迨十八世

紀初，清帝獨創的國家權力中樞機構軍機處一旦登上政治舞臺，則宣告通行近兩千年的「君相制」及其遺存形式「皇帝—內閣制」的壽終正寢。對臣工百姓也好，對行省藩部也好，皇帝至此才真正、徹底、全面、有效地實現了極端專制，而且一直延續到下個世紀中的湘淮崛起、列強入侵，情形才有了改觀。

何以到了十八世紀中國政治會發生如此深刻的變化呢？

這裏恐怕有滿族獨特文化在改造傳統開明專制以及儒家政治價值觀方面所起的直接作用，但通觀中國古代政治發展史，只能認為兩千年來皇權強化的漫長歷程延綿不斷，而最終由清雍、乾二帝畫上了句號。不過，歸根究柢，還是時代使然。十八世紀，在世界大勢發生天翻地覆變化的背景下，中國社會內部長期醞釀的種種變動也日趨劇烈。極端專制的強化和完備出現在十八世紀絕非偶然，它正是適應這一百年間新形勢挑戰的產物。

同樣迎接挑戰，中國的政治變革與西方的政治革新大相逕庭。西方政治民主化的成功經驗固然令人神往，但理智地思索，十八世紀的中國並不具備產生民主政治的土壤，中國歷史的發展自有其內在的邏輯，從傳統走向現代化的路途還很遙遠。不幸的是，當十八世紀結束以後，中國已經不能如往昔一樣孤立於世界各國之外，獨來獨往了。回首歷史，人們自然會發問：十八世紀中國的政治應該如何評價，它對那個時代，以及對十八世紀以後的歷史究竟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也許透過這一問題的探索，可以大致揭示出今天中國政治的走向。

《十八世紀的中國政治》記錄了筆者多年探索的一孔之見，我願意奉獻給親愛的讀者諸君，期望得到寶貴指教。是為序。

緒 言

十七世紀中葉，明清鼎革，其時中國政治的走向，存在著截然對立的兩種可能性。

清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年）正月，順治皇帝臨幸內院，與大學士范文程、額色黑、寧完我、陳名夏等從容論議：「自漢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為優？」范文程等認為漢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俱屬賢君。順治帝問：「此數君者，又孰優？」陳名夏回答：「唐太宗似過之。」順治帝則不以為然。這位年輕皇帝最推崇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就此，他發表了以下一段極富特色的評論：「豈獨唐太宗，朕以為歷代賢君莫如洪武。何也？數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善者，至洪武所定條例章程，規畫周詳，朕所以謂歷代之君不及洪武也。」^①

事隔八年，即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思想家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指名抨擊明太祖說：「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他認為，欲洗蕩明季政治的污泥濁水，只有恢復唐宋丞相舊制^②。切不要以為這僅僅是書生議論。黃宗羲抱負甚高，自謂著《明夷待訪錄》，可比於箕子之向周武王論列入君治天下的「九疇」之綱，若遇明主用之，三代以下延綿不絕的「亂

運一可望由此而終結³。

對明太祖及明初政治的褒貶竟如此大相逕庭，似乎再明白不過地昭示，十七世紀中葉中國政治正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是沿著以明太祖廢丞相為標誌的強化皇權方向繼續走下去呢，還是反洪武之道而行之，以丞相制對皇權加以某種補充、限制和制衡。

對於丞相職權最早、也是最經典的論述大概莫過於漢相陳平了。漢文帝問右丞相周勃：「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周勃愧不能對，汗出沾背。文帝轉問左丞相陳平，陳平回答，決獄責之廷尉，錢穀責之治粟內史。文帝不懌，問陳平：「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對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鷺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文帝乃稱善⁴。丞相的權力來自皇帝，所以陳平自謂「待罪宰相」；但丞相不僅是統百官、總萬事，掌握最高行政權力的天子輔臣，而且負有近乎玄奧的變理陰陽重任。應劭是這樣釋「丞相」一詞的：「丞者，承也；相者，助也。」⁵他從語義學上簡捷而準確地闡明了君相的權力關係，可謂掌握了相權的真諦。秦漢以降以迄明初，一千五百年間，丞相的名號雖屢有變化，相權的盈縮歷代也不可一概而論，但司丞相之職者「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⁶，「佐天子，理萬幾」⁷，所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特殊地位卻沒有根本變化；君臣上下也習慣於以陰陽不調責之宰相⁸，宰相因此而獻身者亦偶見史書。

丞相制的政治生命力何在？首先，專制時代主宰國家和人民命運的皇帝不可能都是聖君。賈誼早就說過人主有「上主」、「中主」和「下主」之分，像堯舜那樣的上主不必憂，而桀紂那樣的下主，又不可勝憂，惟「可引而上，可引而下」的中主，「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才是最可憂慮的⁹。黃宗羲把個中道理講得最深刻：「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宰相既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為賢者矣，不亦並傳子之意而失者乎？」¹⁰再者，像中國這樣地廣人眾的大國，政務之繁劇，也不是天子個人所能獨攬的。隋文帝「勤勞思政」，號「勵精之主」，唐太宗則以為：「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於合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¹¹以唐太宗這樣不世出的聖君尚且需要選任宰相籌畫商量，更無論所謂中主或不賢之君了。可見傳子不傳賢的專制政體，若能借助賢相輔佐，其痼弊至少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匡救。「天下治亂繫於宰相」¹²，該具有何等沉重的歷史分量呵！

但如「貞觀之治」那樣聖君賢相和諧融洽、宮府一體的治世竟如此罕見，則足以證明君權與相權在相互依賴的同時，又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問題。從皇統延綿的長遠利益考慮，明智的帝王深知必須得賢相贊襄和啟沃，平庸之主也不得不依賴丞相去主持運轉整個官僚機器。問題在於，丞